

十五年,由于三藩之乱,筹饷紧迫,复将十年起科改为三年起科,如此大的反差使垦政再度受挫。由此可见,新垦土地起科年限的屡屡变更,主要是以增加财政收入为目标的,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困难,但对垦政却是十分有害的,如果不是急于起科,康熙二十年前的土地开垦步伐当会加快。三藩之乱平定后,安定局面形成,财政亦逐步趋于好转,新垦土地的起科年限又由三年改为六年,土地开垦再起高潮。据统计,自康熙二十六年迄于康熙五十六年,各省报垦额高达184 948顷。(彭雨新:《清代土地开垦史》,第70页)

通过上述诸要素的分析,不难看出双重目标下的政策很难尽如人意。当然,我们对于任何政策的研究与考察,也决不应止于政策本身,更重要的在于揭示政策执行过程中所凸显出来的问题及应对之策。事实上,雍正朝正是吸取了顺、康时期考成议叙的教训,认识到浮夸风的危害,于是在雍正十二年户部复准:“各省州县官册报开垦,督抚务委隔属贤员丈勘。所垦之数与所报之数果属相符,取结送部,准其议叙。倘有不符,即将原报之官题参。如委官蒙混,一并处分。”(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六六《户部·田赋·开垦一》)但这一问题的彻底纠正是在乾隆初年才得以实现的。乾隆朝在吸取前朝教训的

基础上,颁布了山头地角、零星土地“免其升科”的谕令,之后屡次申令零星土地“永免升科”、“永为世业”,(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六四《户部·田赋·免科田地》)遂促成了乾隆时期对山头地角、水滨河尾的开垦狂潮。需要指出的是,起科年限的调整虽有利于增加地亩、提高田赋收入,且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危机,但由于年限放宽后的过度开垦,特别是山区、水域的滥垦,严重破坏了自然生态,带来了诸多弊害,致使乾嘉以后的水患不断加剧。

综上所述,清初社会面临的双重任务是土地开垦政策具有双重目标的重要原因,双重目标下的垦荒政策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偏差,因而也就不可能把利益效用和政治效应较好地连接起来。诚然,任何一项政策都会历经逐步完善的过程,问题是如何把政策的负面效应减小到最小程度以换取利益的最大化,这一点颇值得人们深思。

收稿日期 2007-12-10

作者景东升,历史学博士,湛江师范学院法政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 存心】

## 论汪精卫的“大亚洲主义”

张殿兴

与抗战时期日本在华扶植的其他汉奸傀儡组织相比,汪伪政权不仅在组织上更完备,而且还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即以孙中山“大亚洲主义”为外衣的不折不扣卖国的汪记“大亚洲主义”。汪精卫自诩为孙中山先生思想、理论、事业的信徒和继承者。抗战时期,他置民族利益于不顾,公开投入日本的怀抱。他打着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旗号,混淆视听,欺骗民众,为自己的投敌行为进行辩解。

—

汪精卫投敌后,为了替叛国投敌行为寻找理论根据,便将近卫“三原则”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扯在一起。汪宣称:近卫三原则正是大亚洲主义的理想,也就是三民主义的根本精神,“质而言之,目前中日和平运动的基本原则和三民主义的根本精神是一致的,吻合的”。“本着三民主义去做,中国固然得到自由平等,同时也有力量与日本分担安定东亚,建设东亚的责任。所以就中国

来说,三民主义是救国主义,就东亚来说,三民主义也就是大亚洲主义”。(《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选集》,伪中央电讯社编1944年出版,第71~72页)在汪精卫看来,孙中山一直将中国视为一个次殖民地,并为改变中国的次殖民地地位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这是事实。然而,在如何能够把中国从次殖民地的地位解放出来,达到自由平等的问题上,汪将孙的理论做了歪曲的解释。汪称:“孙先生定下了两个方案,第一是要中国自己努力,第二是要与先进国的日本共同协力”。汪认为,尽管孙中山也有批评日本的时候,但他的批评总是“期望日本与中国携手为友,不要与中国相对为敌”。“冤仇宜解不宜结”,“这是民族主义的精髓,也是民生主义的精髓”。(《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选集》,第66~68页)

关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大亚洲主义”的关系,汪精卫进一步歪曲解释说:“没有民族主义,不能唤起中国民众的自觉,团结中国民众的力量;没有大亚洲主义,不能唤起东亚民族的自觉,团结东亚民众的力量。所以孙先生于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把三民主义讲完之后,使

[便]于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神户讲大亚洲主义……遗嘱中的‘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所谓‘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人人皆以为是苏联,然而遗嘱所说,并不是指定哪一个国家,而是指定‘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如果日本以平等待我,正是大亚洲主义所期望的。”(《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选集》,第159页)

汪精卫认为:“民族主义与大亚洲主义,在过去中日命运相克的时代,看上去似乎不相容的,在今日中日命运共同的时代,则不只是相连贯,而且可以说是相融合而成为一体了。中国若不能得到独立自由,则无分担东亚之资格,东亚若不解放,则中国之独立自由终于不能得到保障,这是每一个中国人所应该铭心刻骨的,同时日本既然盼望中国分担东亚之责任,当然以平等待我,这是自近卫声明以来,已成为不动之国策,一致之舆论。”因为自“鸦片战争以来,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不只中国,与中国同受侵略的,还有日本。不过日本摆脱得早,因此取得自由平等,先于中国数十年。只是[要]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一天不消灭,则日本一日有再受侵略的危险,就此一点,中日两国命运,原是相同的。前此双方因为忽略了这一点,将一个相同的命运,变而为相克,这是十分痛心的事。经过及时反省之后,同时努力,同时为共同命运而努力”。(《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选集》,第160页)这便是中日两大民族合作协力的原因。

对于日本提出的“东亚协同体”和“建设东亚新秩序”,汪精卫认为其要点有二:“其一为排除侵略主义,其一为排除共产主义。”在汪看来,侵略主义来自西方,以经济侵略为骨干,以军事侵略辅之。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由于受到西方的侵略,沦为“次殖民地”;共产主义亦来自西方,其阶级斗争之说,“将使中国人类,相砍以尽”。“侵略主义,譬如多年痼疾,能使中国奄奄不振,以至于死。共产主义,譬如暴病,能使中国咄嗟致死”。“中国若受侵略主义、共产主义之祸,则东亚之一部分受其祸,从而东亚全体亦将受其祸,结局日本亦将不免”。“东亚共同体”也好,“建设东亚新秩序”也罢,目的在于“以自由独立之精神,排除侵略主义、共产主义,使(其)不得为祸东亚”。(《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选集》,第52页)因此,不管是“东亚协同体”还是“建设东亚新秩序”,在汪看来,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及三民主义是完全一致的。

## 二

近代日本同近代中国一样,曾受西方列强侵略之苦,这是事实。然而,经过明治维新后日益强盛的日本,不思过去自己遭受外敌侵略之苦,帮助东亚乃至亚洲其他国家摆脱受侵略、遭奴役之地位,反而很快加入对亚洲其他国家侵略的行列,趁火打劫,踏上一条西方帝国主义追随者之路,对亚洲其他国家进行侵略。而这种侵

略又是在“解放亚洲”的幌子下进行的。不少支持日本对外侵略的学者为日本的这种侵略行为进行辩解,这些辩解既是日本“东亚联盟”运动得以兴起的早期酝酿,又成为战后日本国民对日本军国主义罪恶不能充分认识和彻底清算的重要因素。而汪精卫替日本侵略行为进行辩护的言论,同早期日本大亚洲主义者的观点如出一辙,成为日本“侵略有理”的应声虫。

东亚联盟理论是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出现的一种影响较大的侵略理论,结成东亚联盟的基本条件是“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和政治独立”。汪精卫投敌和建立傀儡政权后,以东亚联盟论附会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将它作为建立伪政权的理论基础,并在东亚联盟论中最具欺骗性的“政治独立”上大做文章,将它从联盟论的最后一位提到第一位,又在上述三个条件之后加上“文化沟通”一项,并得到日本东亚联盟论者的认同,此后东亚联盟的条件由三个变成四个。按照汪精卫的解释,加上“文化沟通”的目的,主要是让中、日两民族加深了解,避免纠纷,共同去创造人类更高的文明。即要中国人民与日本合作,使日本早日从中国战场拔出脚来。(史桂芳:《“同文同种”的骗局——日伪东亚联盟运动的兴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出版,第61~62页)在该理论的指导下,兴起了一场颇具规模的东亚联盟运动。

在谈到开展东亚联盟运动的必要性时,汪精卫宣称:“东亚联盟之组织,在使东亚各民族国家,各本于自由独立之立场,向于共存共荣之目的,共同努力……自中日事变以来,日本声明无灭亡中国之意,日本之愿望,在与中国协力以共同建立东亚新秩序”,中日两国“苟能协力,则中日可以共存,东亚可以复兴”。“现代国家渐趋于集团活动,即素持孤立者亦不能外,况东亚受帝国主义侵略之毒害,于今已及百年,最近共产主义之猖獗,亦已二十余年,日本励精图治,以独立撑柱之中国民族,秉承国父孙先生之遗教,努力不懈,欲建立自由平等之中华民国,以确立于东亚,此两大民族,自爱其国家,互爱其国家,相与本于政治独立之立场,厉行经济合作,军事同盟,文化沟通,使道义一贯,利害一致,其必能举共存共荣之实,而致东亚于复兴……大亚洲主义为东亚联盟之根本原理,东亚联盟为大亚洲主义之具体实现,东亚诸民族国家,兼相利,交相爱,创此大业,克底于成”。(《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选集》,第160~161页)

在民族失败主义思想驱使下轻信日本的承诺,和对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真谛的错误理解,是汪精卫主张中日“亲善”,开展“和平”运动的重要原因。汪精卫置日本侵华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事实于不顾,幻想日本会主动放弃侵华政策,做中国的真正朋友。他认为,中日两国由于没有明了亚洲危机和亚洲人责任的“重大”,“阴错阳差”地打了起来,“做起仇敌来”,但中日双方“终必有使其回过头来做朋友之一日”,在他看来,中日战争“一方胜利,一方失败,决不是真胜利;两方都得到胜利,

这才是真胜利”。“如果明白了大亚洲主义的根本意义,明白了亚洲的重大危机,明白了亚洲人重大的责任,则对于中日两国之只可做朋友,不可做仇敌,便有了真正的认识,(中国)便不怕(日本)没有诚意,不怕会上当了”。(《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选集》,第30~31页)“如果日本定要灭亡中国,我们除了战下去,更无他法。如今日本已将和平条件提出来,这些和平条件,既然不能说是亡国条件,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言和平?”(《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选集》,第14页)

为了给自己的“主和”寻找历史渊源和理论根据,汪精卫煞有介事地宣称:“总理孙先生告诉我们:‘中国革命之成功,有待于日本之谅解。’……(民国)十三年间,孙先生在广州手定国民政府建国大纲,那时候对着中日关系,是照着以上所述方针进行的。十四年间,孙先生逝世,我继承遗志,主持国民政府,对于以上所述方针,兢兢业业,不敢少变。十七年间,便不然了,济南事件为中日关系恶转的起头,但是冤仇宜解不宜结,中国此时只宜竭力忍耐,竭力解释,使中日关系由恶转而复归于好转,不幸当时国民政府计不出此,遂使中日关系由恶转而更恶转,由此一直至于九一八事变发生。”(《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选集》,第24~25页)

在这里,汪精卫无视日本自明治维新后不断对中国进行侵略这一基本的历史事实,将中日关系“恶转”的原因全部推到中国身上,即由于中国方面的排日造成的。而事实上,正是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在济南事件的处理上采取了忍让态度,使得日本得陇望蜀,欲壑难填,进一步刺激了日本的侵略气焰,认为中国软弱可欺,随后,它占东北,侵华北,阴谋步步得逞,并最终发动了一场全面的侵华战争,企图变整个中国为其殖民地。

基于上述的错误认识,汪精卫认为中日战争的爆发,中日双方都应当承担责任,这就完全抹杀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和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的正义性。汪精卫称:“酿成这一次战争,中国方面全然没有责任吗……中国何以会被侵略呢?因为中国积弱。中国何以会积弱呢?因为中国之内,军阀纵横,共匪猖獗。中国何以会军阀纵横共匪猖獗呢?因为中国没有政治修明,经济没有发达。这样中国能说没有责任吗?”因此,中国人要有“罪己的精神”,“要有深刻的反省”。他说:“我们如果肯将孙先生的大亚洲主义细心研究,便可知,中日两国只可为友,不可为敌。我们如果肯将事变以来日本方面建设东亚新秩序的主张细心研究,从日本政府所宣布的国策,以及日本全国的舆论一一探讨,便可知日本确具有排除中日两国以往纠纷,重新建立将来亲善关系,共存共荣复兴东亚的决心。”“我们如果肯将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原则,细心研究,便可知根据这些原则以定出合理的方案,俾中日两方皆受其益,并非不可能。我们经过了这种研究之后,应该恍然大悟。从前没有及早想到此着,以致弄得兵连祸

结,民不聊生。”中国人应当照着古人所说的“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地开展和平运动。(《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选集》,第121~122页)

汪精卫依据自己对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歪曲理解,不仅将迅速结束中日战争,实现中日和平看作是对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而且是中国摆脱贫困,实现强国之梦的金玉良方。他认为“中国的出路在与日本诚意合作,巩固东亚和平”(《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选集》,第42页)。但他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日本是侵略者,中国是受害者。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目的是要变中国为其殖民地,在达到这个目的之前,迫于中国人民的坚决抵抗以及其小国、寡助等不利条件的影响,它有可能变换手法,但侵略本质是不会变的;具有反帝爱国传统的中国人民又岂能听任侵略者在自己的国土上横行霸道,任其宰割而做顺民奴仆呢?中国人民爱好和平,但他们需要的不是屈辱的“和平”,中国人民誓死不做“亡国奴”,他们有决心,也有能力将入侵者驱逐出去,争取真正的民族独立。

汪伪政权出笼后,为了掩盖其傀儡性质,给新“中央政府”的产生寻找理论依据,汪精卫宣扬世界各国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已逐渐地“由一国单独行动进入集团行动了”,因而作为命运“相同”的中日两国进行“联合”,并“同时为共同命运而努力”是十分必要的。汪精卫死心塌地地把自己的命运牢牢地绑在了日本侵略者的战车上。他将“大亚洲主义”与日本发起的“东亚联盟”运动直接联系起来。汪精卫宣称:“大亚洲主义为东亚联盟之根本原理,东亚联盟为大亚洲主义的具体体现”,并表示要与日本“同心同德,尽心尽力,在此日本对英法战争中,做一个有力的伙伴”,与其日本主子一道“共存共荣,复兴东亚”。

### 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提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战略目标。汪精卫为虎作伥,将其民族投降主义的“大亚洲主义”理论大大推进了一步。

首先,汪精卫的“大亚洲主义”做了完全符合日本帝国主义需要的解释。他说: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骨干,“以前虽有此理想,而未得到实现的时机,及至日本提倡建设东亚新秩序,本于东方道义精神,以求中日的共存共荣,则大亚洲主义实行的时机,已经到来了”(《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选集》,第339页)。“大亚洲主义”是“东亚联盟理论之渊源”,是“东亚民族革命之指导原理,东方民族对抗外来侵略主义之自卫手段”,是东方的民族主义,是“排除西洋的功利思想的民族主义”。汪精卫宣称:“由于日本对英美开战,中国自和平运动发起以来所遵守而申明的大亚洲主义,已经由理论时代进入实行时代”,此次战争如果失败,“则整个东亚民族将随印度民族,及非洲的黑色人种,美洲的红色人种,澳洲的棕色人种,同受奴隶的待遇;整个东亚,将永

久为英美的次殖民地,没有翻身的希望!”反之,“如果战胜了英美,则百年以来的侵略势力,一扫而空;东亚得到解放,中国得到自由平等”。(《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选集》,第258页)汪精卫的上述言论,不啻是为日本帝国主义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摇旗呐喊,鸣锣开道。

其次,汪精卫认为,“如今的生存竞争,不只是国家与国家间的竞争,而(且)是国家集团与国家集团间的竞争”。“国家集团主义为东亚新秩序建设之准则”,“东亚民族非团结无以自卫,非互助无以共存”;“东亚联盟的目的在于自卫而非侵掠,换言之,在求东亚各国兼相利交相爱,以谋东亚民族之共存共荣”。他极力表示,“中国是东亚的一部分,无疑的应该站在东亚的国家集团”立场(《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选集》,第339页),他所领导下的傀儡政府愿与日本帝国主义协力对抗英美,同甘共苦,同生共死。汪精卫宣称:“日本是东亚的一部分,中国也是东亚的一部分,东亚的安危,是中日两国的安危,东亚的荣辱,是中日两国的荣辱。中日两国不能超于东亚之外,只有同心协力,复兴东亚。”(《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选集》,第288页)“友邦于我无所求,所求者是中日协力,保卫东亚;我于友邦无以应,所应的也就是中日协力,保卫东亚。”(《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选集》,第294页)所谓“同甘”,是指中日两国将来的“共存共荣”;所谓“共苦”,是指中日两国现在的同心协力,克服一切困难。(《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选集》,第338页)

汪精卫极力鼓吹“黄色人种革命”,以配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太平洋战争。他宣称,“百年以来英美两国挟其军事侵略、经济侵略双方并进之国策,美洲的红种、非洲的黑种、澳洲的棕色人种,次第受其摧残,不但国土沦丧,连人种也几乎沦亡。亚洲的黄种,亦同样受其厄运。自从日本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及东亚共荣圈等口号,东亚诸民族认识一条光明正大的道路,向着共存共荣的将来,致其最大的努力”,而黄色人种的解放,必然“奠定世界人种解放的基础”。日本发动的大东亚战争,“不仅会使整个世界的地图,洗去凄惨的颜色,显出光明灿烂的异彩,也是中国解脱英美侵略势力千载一时的良

机。”(《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选集》,第227页)因此,“大东亚战争,是大东亚全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中国既然是东亚一部分的土地,中国的民族,既然是东亚一部分的人民,那么,中国只有参加大东亚战争……中国如果想从英美手掌心里解放出来,不再做他的次殖民地,只有大东亚战争的胜利,才可得到;所有的东亚民族,如果不想随非洲澳洲以及西亚诸民族之后,只有求之于大东亚战争的胜利”。因此,“我们除了以共苦求同甘,以共死求同生,实在没有第二条路”。东亚民族应该“自爱其国,互爱其邻,共爱东亚”。(《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选集》,第365~368页)汪精卫一味鼓吹“黄色人种革命”,试图通过肤色人种来掩盖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本质,归根到底,是为其卖国行为进行掩饰,是对中华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的出卖与背叛。

汪精卫自从投敌之后,为了给他的卖国行为进行辩护,一再宣称他的所作所为,完全是按照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来进行活动的。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采取断章取义的手法。而实际上,汪精卫的“大亚洲主义”只不过是拾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理论的牙慧,并没有什么新鲜东西。所不同的是,他的“大亚洲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有帝国主义侵略野心的狂妄,也不敢公开为日本帝国主义赤裸裸的侵略行为进行辩护,却多了一层奴颜婢膝的奴才气和令人作呕的虚伪性。他将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理论的精华部分完全剔除,将孙中山早期思想中的消极成分进一步发挥,并糅进日本的“东亚联盟”、“大东亚共荣圈”、“黄色人种革命”等论调,为其所用。它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毫无共通之处,只不过是极富侵略意义的日本“大亚洲主义”在中国的汉奸版而已。

收稿日期 2007—10—12

作者张殿兴,历史学博士,天津行政学院党建研究所副教授。

【责任编辑 公羽】

## 论史胆

龚 静

关于史家素养,传统的说法是才、学、识,后来加上史德。也有提出史胆的,较早见于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赢是非之尤,秉

笔荷担,莫此之劳。”(《文心雕龙》第十六章《史传》,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版,第191页)但史胆之说一向不大被重视,或者说在古代社会,史学被当作御用学科,史家落笔,并